

· 研究论坛 ·

米斯尔银行与埃及经济民族主义的 构建（1920～1939年）

李芳洲

内容提要 1920年，由埃及著名实业家塔拉特·哈伯创立的米斯尔银行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埃及诞生的重要经济机构。其初衷是利用银行资本创造新产业，实现埃及经济的独立发展和多样化。米斯尔银行是在埃及融入世界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和塔拉特·哈伯民族主义思想形成背景下建立的。它的经济金融发展实践是构建埃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历史尝试。米斯尔银行发展“超政治性”的历史悖论、埃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塔拉特·哈伯经济民族主义的理想化，导致米斯尔银行出现发展性危机。在塔拉特·哈伯领导下的米斯尔银行虽未能实现其最初目标，但其倡导的埃及经济民族主义实践在推动埃及经济独立、发挥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促进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关键词 经济民族主义 埃及 米斯尔银行 塔拉特·哈伯

作者简介 李芳洲，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副教授（西安 710069）。

米斯尔银行（Bank Misr，又译作“埃及银行”）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20～1939年）在埃及诞生的重要经济机构。它是由埃及著名实业家塔拉特·哈伯（Tal'at Harb）于1920年创立的，是埃及第一家由埃及人筹资和管理的银行。该机构建立的目的是利用银行资本创造新产业，实现埃及经济的独立发展和多样化。因此，米斯尔银行被视为引领埃及经济走向独立的民族象征。银行成立初期发展顺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历了快速发展期，形成了米斯尔集团并成为埃及工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米斯尔银行发生危机，不再是创建埃及现代民族经济的原

动力,也未能实现其最初目标。但是,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倡导的经济民族主义实践为埃及民族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生产性、民族性和工业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战略框架,这也是埃及自近代以来首次由私人资本主导构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尝试。因此,对米斯尔银行与埃及经济民族主义互动关系的探讨为我们解读埃及现代化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

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相对薄弱。多数学者都会提及米斯尔银行在埃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该议题进行的系统研究较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埃里克·戴维斯(Eric Davis)、罗伯特·蒂格诺(Robert L. Tignor)和马里乌斯·迪布(Marius Deeb)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分别从米斯尔银行与埃及工业化、外国资本与埃及资产阶级的崛起及其互动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①,这些研究成果为解读米斯尔银行与埃及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内学术界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经济发展的研究,大多散见于一些中东通史著作和埃及史著作,而以米斯尔银行为案例进行专门研究且将其置于埃及经济民族主义构建视野下的成果尚付阙如。因此,本文拟从埃及融入世界市场为切入点,分析米斯尔银行成立的背景,阐述米斯尔银行构建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进而对其经济民族主义的危机成因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 米斯尔银行的创立

1920年米斯尔银行的建立是近代以来埃及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埃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发展累积效应的产物。

(一) 埃及融入世界市场与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埃及经济与世界市场的接轨始于长绒棉在埃及的广泛种植。穆罕穆德·阿里当政时期(1805~1849年),强化国家土地所有制,实施垄断生产和农产品的专卖制度,旨在防止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外国资本的涌入。但是,1820年长绒棉的引进推动了埃及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到19世纪40年代,埃及棉

^① Eric Davis, *Challenging Colonialism: Bank Misr and Egyptian Industrialization, 1920-194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195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Marius Deeb, "Bank Mis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ocal Bourgeoisie i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2, No. 3, 1976.

花出口增至24万坎塔尔（1坎塔尔等于45公斤），^①这不仅为埃及带来了农业产出盈余，也为外国资本进入埃及市场提供了机会。继阿里之后，其继任者阿巴斯一世、赛义德、伊斯梅尔和陶菲克以棉花生产为核心，逐步实行国有土地私有化并推行欧化政策。埃及遂以原棉生产为基础逐渐融入世界市场，1880年埃及棉花出口约占该国商品出口总值的71%。^②在此期间，埃及统治者为了推动棉花产业发展，加大了在灌溉、商品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力度，但建设资金在国内无法筹集，于是埃及开始依赖外国资本。这些资本的融资条件不甚宽松，往往使埃及政府背负巨额债务。^③1876年，埃及政府的债务规模达到7100万英镑，其中外债为6800万英镑，每年需支付利息500万英镑，占埃及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④1876年，埃及政府宣布财政破产，接受英国和法国对埃及的“双重监督”，两国负责监管埃及国库收支，以确保能够实现贷款的分期偿还并支付利息。1878年，英、法两国代表在埃及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等要职，进而对埃及政府的财政金融进行直接控制。这种无视埃及主权的做法直接导致了1881年的奥拉比起义，起义一直持续到1882年英国入侵并占领开罗，埃及从此进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882~1922年）。

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埃及完全融入世界市场。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在埃及建立棉花种植园，以满足英国国内纺织品供应的需求；另一方面，埃及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投资场所。根据克劳利（Crouchley）估计，埃及公司的外来资本从1892年的608.5万埃镑（1埃镑约等于0.0492英镑）增长到1914年的7125.3万埃镑。^⑤尤其在1889~1907年期间，随着埃及大规模土地的开垦，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埃及，英、法、比等国纷纷在埃及设立多家银行、贷款抵押及工商业公司。这些外国资本不利于埃及本土工业化的发展，却有助于欧洲国家商品流入埃及市场并借此攫取巨额利润。^⑥据统计，

① 哈全安著：《中东国家史610-2000：埃及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② Mohammad A. Chaichian, "The Effects of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on Urbanization in Egypt, 1800-197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0, No. 1, 1988, p. 28.

③ 这时期债务与伊斯梅尔个人的挥霍无度也有很大关系。

④ 哈全安著：前引书，第58页。

⑤ A. E. Crouchley, *The Investment of Foreign Capital in Egyptian Companies and Public Debt*, Aron Press, 1936, p. 148.

⑥ Brecht De Smet, Gramsci on Tahrir,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Egypt*, Pluto Press, 2016, p. 108.

1914年,埃及股份公司实收资本的92%由外国公司控制。^①此外,英国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拉拢埃及地主阶层,迫使政府承认土地所有者一律享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并把王室抵押的数百万费丹(1费丹等于1.038英亩)领地分割成大块土地公开出售。受益者除外国土地公司外,还有埃及大地主和中等地主贵族。由此,埃及地主和贵族在英国的卵翼下得到了实惠,埃及出现了一个与英国棉花市场和殖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大地主阶层。尽管埃及的大地主与外国商业精英^②成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埃及社会历史发展的两大主要力量,但二者潜在的利益对立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受世界棉花市场的波动以及1907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埃及大地主和棉花商人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态度发生了变化,并且有了改变经济地位的想法,这直接推动了埃及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政治与经济独立问题的新思考。

埃及民族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国家的独立更需要以经济独立为根基,而解决经济独立问题则需聚焦外国资本在埃及的经济活动。因此,他们要求政府加强对外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监管,呼吁建立由埃及人自己出资和管理的国家银行。虽然建立一家本土的埃及国家银行的想法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阿里时期,但是直到1907年经济危机之后,这一想法才变得更加成熟。1908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乌马尔·鲁提菲(Umar Lutfi)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一文,声称“埃及独立必须模仿外国人开设自己的银行和公司”^③。1909年,他与塔拉特·哈伯创立了合作金融与贸易公司,此举加快了成立国家银行的步伐。1911年,塔拉特·哈伯向埃及国民大会提交了第一份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详细提案,大会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得到了与会成员尤其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支持。在埃及民族主义者看来,只有建立本土银行才能在棉花的营销方面与外国商人竞争,保障他们的利益,且他们可从中获得低息贷款。1913年,埃及商人效仿外国商会,在开罗成立了埃及商会。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暴露了埃及单一棉花出口经济的脆弱性与依赖性。大战不仅使埃及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也使埃及中断了与

① Marius Deeb, “The Socioeconomic Role of the Local Foreign Minorities in Modern Egypt, 1805 – 196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9, No. 1, 1978, p. 16.

② 这里的商业精英主要指在埃及定居的外国少数群体的实业家和商人,如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See Marius Deeb, “The Socioeconomic Role of the Local Foreign Minorities in Modern Egypt, 1800 – 1961”, p. 17.

③ Eric Davis, op. cit., p. 74.

欧洲国家的贸易。为此，埃及政府做出一系列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1916年成立埃及工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埃及政治家 and 企业家伊斯梅尔·西德基（Isma'il Sidqi）、塔拉特·哈伯以及一些外国和本土的重要经济界人士组成，其任务是调研埃及的工业制造能力，为埃及产品开拓新市场提供智力支持。委员会通过对埃及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埃及必须实现经济发展多样化，减少对单一商品出口的依赖；二是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进口替代产业，工业化是有效避免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发生革命的重要基础保障^①；三是埃及急需成立一家国有银行，它不仅能提供短期信贷（即发挥商业银行的职能），而且也能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所需资本（即发挥工业银行的职能）。^② 委员会还认为埃及工业化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保护，埃及经济变革的引擎将是私人资本。^③ 这些经济发展建议不仅为米斯尔银行的成立给予了权威或半官方的支持，也影响了该行的早期发展规划。

此外，大战期间埃及民族资本的暂时发展与地主阶级债务负担的减轻，也为埃及新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当时，银行存款利息合法化也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可。这些经济发展新动向不仅赋予了埃及人争取经济主权的资本，也推动了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

（二）1919年革命热情与塔拉特·哈伯的民族主义思想

一战后，由于英国拒不履行埃及独立的诺言，以萨得·扎格卢勒（Saad Zaghlul）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呼吁结束英国保护，争取埃及独立。1919年3月，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萨得·扎格卢勒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并把他们流放到马耳他岛，进而在整个埃及引发了一场示威和暴乱浪潮，并导致1919年至1922年间埃及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正是在这场革命动荡中，埃及人民反英情绪达到顶峰，埃及民族主义者把成立埃及国家银行看作是摆脱英国统治的有效手段。他们呼吁人们抵制英货，劝告人们从英国银行提取存款，转存至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银行，并号召人民公开讨论并宣传建立一家埃及国有银行的必要性。成立一家国有银行成为埃及人共同的呼声，正如埃及历史学家

^① Robert L. Tignor, "Bank Misr and Foreign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8, No. 2, 1977, p. 162.

^② Eric Davis, op. cit., p. 76.

^③ Robert L. Tignor,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Foreigners in Egypt, 1920-1950: From Millet to Hau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No. 3, 1980, p. 420.

乌马尔·鲁提菲所言：“毫无疑问，米斯尔银行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19年革命精神，它赋予了埃及人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变革的精神动力。”^①

当然，米斯尔银行的成立离不开其创始人塔拉特·哈伯的贡献。与当时大多数埃及民族主义领导者不同，塔拉特·哈伯很早就意识到实现真正的政治独立是埃及人的奋斗目标，但其前提是埃及人必须控制自己的经济命脉，否则政治独立就是空谈。所以，他一直关注和思考埃及经济发展问题，而他的教育背景与职业生涯对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1885年，哈伯中学毕业后进入赫迪夫法学院学习，他在这里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很快成为埃及本土知识精英界的一员。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受雇于政府，之后在几家外国公司的董事会任职。这期间，他加入了埃及最具影响力的地产公司之一——科姆·奥博（Kom Ombo）公司，并任该公司驻开罗办事处的负责人。在开罗，他与埃及一些土地大亨和金融家族建立了广泛联系，这些家族与欧洲资本往来密切，这使得他对国际金融资本运作更加熟悉。由于突出的管理才能，哈伯被任命为实力雄厚的大地主乌马尔·苏丹（Umar Sultan）的大型农业地产总经理。这一职业经历使他得以跻身大地主阶层群体，这是他后来为米斯尔银行筹集资金时可资利用的一大优势。^②当然，他也学会了如何操纵埃及上层成员和平衡各方力量，这对米斯尔银行发展同样重要。此外，哈伯还是工业联盟的成员，该联盟是一个主要代表欧洲土地巨头和其他外国土地公司且有雄厚经济实力的集团。总之，这些独特的职业经历足以使他有能力担当埃及民族经济发展的引领者。

同样，哈伯的经济改革思想与伊斯兰宗教价值观密切相关。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一生都为自己的宗教文化感到自豪。他认为埃及人应该表现出更多的凝聚力，这是防止西方文化破坏传统制度、摆脱欧洲对埃及经济控制的必要条件。因此，当埃及自由派人士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呼吁穆斯林妇女丢掉面纱的时候，哈伯对其进行反驳并论证了伊斯兰妇女的特殊社会角色及戴面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丢掉面纱将会导致伊斯兰道德的衰落和邪恶西方文化的入侵，面纱是标志着东西方文化差别的体现。尤其是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保留面纱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对于受到现代

^① Eric Davis, op. cit., p. 112.

^②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1952*, p. 62.

思想观念影响的哈伯来说，这似乎有些保守，但确实弘扬了埃及文化民族主义精神，由此米斯尔银行成立之初就融入了伊斯兰传统文化因素。^①

如果说哈伯对卡西姆·艾敏的攻击显示了他对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忠诚和骄傲，那么对外国资本侵占国家资本盈余的揭露则显示出他对埃及经济命运的关注和深度思考。当1911年埃及政府考虑是否将苏伊士运河特许权延长40年之时，哈伯向大会提交论证报告，表明坚决反对态度。他通过对苏伊士运河公司资产负债表及相关文件的研究，认为埃及在修建运河中投资巨大但收益甚微，所以埃及议会不应扩大外国的特许权。除非该公司对其利润在股东和埃及人民之间做出合理分配，并允许埃及人在运河公司的管理中拥有话语权。此外，他还对比利时电车公司票价过高剥削埃及民众的事实进行揭露和批判……正是这些外国资本的贪婪导致埃及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因此，若要摆脱外国资本的剥削，实现埃及经济的独立发展，埃及首要之举就是成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建立一家真正的国有银行，进而为埃及商人和土地所有者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保护耕种者免受高利贷者的压迫。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哈伯的民粹主义思想发展脉络。

总之，埃及融入世界市场与经济发展新动向的出现，推动了埃及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而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塔拉特·哈伯提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愿景相契合，最终催生了米斯尔银行的成立。1920年4月3日，埃及政府颁布了米斯尔银行成立的官方法令。5月7日，该银行正式成立。塔拉特·哈伯宣称：米斯尔银行具有埃及属性，它是实现埃及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该银行旨在“让埃及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发言权，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②米斯尔银行启动之初，募集了8万英镑资金，拥有来自地主阶层的124个股东。^③正如埃里克·戴维斯所说，埃及工业化不是建立在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社会群体之上，而是得到了一个特殊阶层的支持，这个阶层代表了19世纪传统社会的基石。^④

① Robert L. Tignor,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of 1919: New Directions in the Egyptian Econom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2, No. 3, 1976, p. 51.

② Marius Deeb, "Bank Mis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ocal Bourgeoisie i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2, No. 3, 1976, p. 70.

③ Robert L. Tignor, "Bank Misr and Foreign Capitalism", p. 165.

④ Eric Davis, op. cit., p. 30.

二 米斯尔银行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实践

经济民族主义 (Economic Nationalism) 是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既是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 也是国家争取政治独立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 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 在世界历史上早期的经济民族主义一般都与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影响国家内外政策的思潮, 它往往存在于那些经济上比较落后、不能自主而又急于建立自己独立工业体系的国家, 即主张通过进一步发展本民族的经济使国家真正站立起来, 要求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对国内的企业或产品实行保护性政策。因此, 20 世纪上半叶埃及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多样化的民族经济, 使埃及人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脉, 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对米斯尔银行来说, 其经济民族主义既突出埃及的民族因素, 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民族性, 但也不排除资本与技术的非民族性。^①

(一) 米斯尔银行的早期发展 (1920 ~ 1929 年)

米斯尔银行成立之初发展迅速, 主要得益于 1919 年革命中民族主义者的巨大热情, 从学生团体、地主商人到华夫脱党都给予了米斯尔银行大力支持。但是, 米斯尔银行在早期发展中非常谨慎, 坚持不与任何团体或组织过于接近, 更不与任何政党结盟, 积极支持埃及民族独立。米斯尔银行规定阿拉伯语是其工作语言, 任何外国人不能成为银行股东或董事成员。在股东大会与年度报告中, 塔拉特·哈伯反复强调银行的民族主义特质。因此, 米斯尔银行的早期活动充分体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要义, 在经济与金融领域践行了民族主义思想。

米斯尔银行建立伊始, 由于当时埃及社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 银行得到了埃及社会各主要力量的支持, 尤其是埃及三大主要政党——宗教自由党、自由宪政党和民族党的成员在银行的筹资及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米斯尔银行初期发展首先体现为银行资本的快速增长和银行储户的多样化, 特别是在 1921 ~ 1922 年抵制英殖民当局时期, 银行存款储蓄率增速较大, 1921 年为

^① Najat Abdulhaq, *Jewish and Greek Communities in Egypt: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before Nasser*, L. B. Taturis, 2016, p. 131.

101.5%，1922年为142.2%；而银行账户的平均存款额也从1920年的409埃及镑下降到1922年的192埃及镑。^①这说明受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米斯尔银行吸引了一些普通储户，如小商人和学生等，但富裕的大地主、大商人仍在银行的初始股本和存款中占有最大份额。

随着银行资本的增长，米斯尔银行开始致力于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在塔拉特·哈伯看来，米斯尔银行应该是推动埃及经济特别是工业变革的先锋。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将银行的资金用于创建新型工商业公司，进而推动埃及经济的多样化。1923年，米斯尔银行从其利润中抽出一部分资金，设立特殊账户，为创建工商业公司做准备。^②随后，一批米斯尔银行附属公司应运而生。这些附属公司的主要业务以农业为主，尤其围绕棉花经济展开，维护了银行原始股东地主阶层的经济利益。1924年，米斯尔银行成立了米斯尔纸业公司和米斯尔贸易和轧棉公司，这标志着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形成。1925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又先后成立了米斯尔航运公司、米斯尔灌溉公司和米斯尔电影公司。^③由于这些公司从事棉花采购、轧棉和营销等相对简单的经济活动，不需要大量资本和复杂的技术，米斯尔集团只是聘请少数外国技术专家，以确保公司的“国民性”。到1926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已经成为埃及最大的棉花购买商，而此前其棉花购买力在13家银行中仅居第12位。^④同年，米斯尔银行集团业务拓展到国外，成立了米斯尔—法国（Banque Misr - La France）银行，其目的是为在欧洲的埃及游客提供旅游服务。

这一时期，米斯尔银行集团还参加了工业联合会，并积极推动商业联合会的建立。埃及工业联合会成立于1922年，其成员主要是在埃及工作的外国金融家和实业家。面对埃及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浪潮，工业联合会的成立旨在促进和保护他们在埃及的产业利益。^⑤1925年，塔拉特·哈伯当选为工业联合会董事会成员，积极从事与英国商会为代表的外国商业集团作斗争。尽管米斯尔银行集团和工业联合会是两个不同属性的集团，它们之

① Eric Davis, op. cit., p. 116.

② Robert L. Tignor, "Bank Misr and Foreign Capitalism", p. 169.

③ Vatikiotis, P. J.,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6.

④ Robert L. Tignor, "Bank Misr and Foreign Capitalism", p. 169.

⑤ Marius Deeb, "The Socioeconomic Role of the Local Foreign Minorities in Modern Egypt, 1805 - 1961", p. 19.

间的合作十分有限,但它们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共性需求,如努力争取政府给予当地产品的优惠待遇、降低原材料运费以及采取保护关税制度等政策支持。此外,米斯尔集团还积极推动埃及商会之间的合作。1926年,塔拉特·哈伯成功推动了埃及商会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埃及商会联合会,以便各商会在争取埃及经济独立中能够一致行动,并鼓励建立新的商会组织。

从1927年开始,米斯尔银行集团开始进入综合工业经济发展阶段。作为埃及现代民族经济的发展先锋,米斯尔集团助力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从而使埃及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而且,在塔拉特·哈伯看来,只有工业才能吸纳更多的埃及人参与经济活动,缓解就业压力。基于此,米斯尔银行集团计划建立一个纺织综合体。经过米斯尔银行集团经济部门研究论证之后,1927年4家公司相继成立,即米斯尔纺织公司、米斯尔丝织公司、米斯尔亚麻公司和米斯尔渔业公司。虽然这些公司在埃及工业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的资本总额不大,其中资本较为雄厚的米斯尔纺织公司的最初资本也只有30万埃镑,在它成为埃及棉纺工业主要制造商以后,资本额才增加到100万埃镑。^①这些公司的资本完全由埃及人提供,管理层也由埃及人司职。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发展面临瓶颈:尽管该集团能够吸引大地主、大商人和政府官员购买集团附属公司的股份,但这些资金并不能助力完成预期的工业项目,更依靠自有资金实现埃及的工业化目标。就当时情况看,寻求政府参与发展工业是唯一可行方案。

1929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出版的一份题为《国内产业的创建》(The Creation of Domestic Industries)报告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该报告最重要的一项建议就是提出建立一个国家资助的工业发展银行,为埃及工业发展提供资本保障,以期实现工业增长。报告指出,到目前为止,米斯尔银行集团在推动埃及工业化方面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作为一家从事短期流动性资本的商业银行,不可能成为推动国家工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②报告还倡导制定一个十年工业发展规划,成立由金融企业家、政府及理论家组成的常设机构,审查申请资助的工业发展项目;强调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呼吁埃及企业家建立纺织、化学、皮革、玻璃等工业企业;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新产业,拟议了一

^① Robert L. Tignor, “Bank Misr and Foreign Capitalism”, p. 170.

^②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1952*, p. 104.

份可以成立的28家股份公司名单，并强调新产业必须立足国家实际需求，产品主要用于国内消费。^①此外，报告认为股份公司是适合未来经济扩张和经济埃及化的最佳企业形式。米斯尔银行集团的这份报告对埃及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米斯尔集团所奉行的“经济独立”理念。也就是说，“经济独立”目标的实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米斯尔银行集团计划的实施情况。因此，突破米斯尔集团的发展瓶颈，来自政府支持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尽管埃及政府制定了涉及产品补贴、降低铁路运输费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但报告中的诸多重要建议都未被采纳。据此，米斯尔银行集团继续以商业银行的身份发挥工业信贷银行的作用。^②

随着米斯尔银行集团开始实施更复杂的工业项目，因项目实施需要，它被迫改变过去的管理原则和有限雇用外国技术顾问的模式，开始尝试与外国公司合作。1929年，米斯尔集团与德国棉花出口商雨果·林德曼（Hugo Lindemann）合作成立了米斯尔棉花出口公司。公司注册资本由双方均分，董事会主席为埃及人。塔拉特·哈伯向股东宣布决议时强调，与雨果·林德曼的合作不会改变米斯尔银行的特质，但客观事实则是：米斯尔银行为实现其经济计划，被迫走上与外国资本合作的道路，当然也迎来了米斯尔银行集团扩张的新时代。

（二）米斯尔银行集团与外国资本的合作（1930～1939年）

继米斯尔棉花出口公司之后，米斯尔银行集团与外国资本的合作成为20世纪30年代埃及企业运营形式的新特征。随着合资公司的出现，米斯尔银行集团也渐渐远离了其最初的“国民性”，在经济民族主义实践方面愈益表现出其对外来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这一时期，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既有公司的扩张和一系列新公司的成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7年成立的米斯尔纺织公司，它很快发展成为中东最大的纺织公司。^③

1933年米斯尔纺织公司购买了大量的英国纺织厂设备，拥有484台织布机、1.2万个纺锤，由3台各4500马力的内燃机驱动。^④该公司在1924年至

① Marius Deeb, “Bank Mis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ocal Bourgeoisie in Egypt”, p. 70.

②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1952*, p. 104.

③ Eric Davis, *op. cit.*, p. 134.

④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1952*, p. 129.

1936年间的轧棉量增加了20倍以上,成为埃及第三大轧棉公司;^①1936年,米斯尔棉花出口公司成为埃及重要的棉花出口公司之一,其棉花出口量在1936~1937年间为38 531坎塔尔,在1937~1938年间为44 588坎塔尔。在《国际棉花公报》列出的世界48家最大的棉花出口公司中,米斯尔棉花出口公司位列第12位。^②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棉花产能的一枝独秀也反映了埃及工业化的困境,即经济发展基于品种有限的农作物基础之上,农业部门缺乏多样性。

由于米斯尔银行集团参与了棉花生产的各个环节,它在货物、票据、证券和其他抵押贷款方面的资金额由1930年的4 887 232埃镑增加到1936年的8 153 737埃镑,增长了66.8%。到1936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已成为埃及第二大商业银行,也是该国国内最大的控股公司。^③当然,米斯尔银行集团的迅速发展除自身努力之外,还得益于埃及政府1930年以来出台的关税改革政策。埃及政府不仅制定了对米斯尔银行集团有利的关税政策,还给予其创建国家航空公司的专权。这进一步促使米斯尔银行集团走上了与英国公司合作的道路。

虽然米斯尔银行集团在早期发展阶段与英国公司没有任何联系,但是随着其工业化项目的推进,该集团高层开始意识到与英国联系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民用航空方面。对英国来讲,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想控制埃及的交通系统,反对外国航空在埃及拥有着陆权和航空权。鉴于无权干涉埃及民族航空公司成立的事实,英国便以英埃公司合营的方式,以期控制埃及航空系统。最初,英帝国航空公司试图与米斯尔银行集团合作,塔拉特·哈伯考虑到此举可能会涉及诸多政治问题而拒绝,但迫于业务需要最终还是接受了英国航空工程公司(Air Works Company)抛出的橄榄枝,双方于1932年成立了埃及第一家航空公司——米斯尔航空工程公司(Misr Air Works Company)。该公司初始资本为2万埃镑,其中40%的股份为英国公司持有。^④对于米斯尔银行集团来说,这家公司不仅从事埃及国内的航空服务,还将成为埃及与其他阿拉伯邻国之间的重要交通纽带,由此先后开

① Eric Davis, op. cit., p. 137.

② Ibid., p. 135.

③ Ibid., p. 138.

④ Marius Deeb, "Bank Mis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ocal Bourgeoisie in Egypt", p. 77.

通了埃及至苏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航线。

虽然米斯尔航空公司的成立提升了埃及人的国际形象，但它在商业运营收益方面则未能达其预期，米斯尔银行集团不得不通过游说政府获取财政补贴来维持运营。因此，该公司不仅使米斯尔银行集团卷入越来越派系化的埃及政治生活，也使英国人对整个米斯尔银行集团产生了更大的兴趣。1934年，米斯尔银行集团相继又与英国合资成立了米斯尔保险总公司（米斯尔银行集团持49.8%股份）、米斯尔海上航运公司（米斯尔银行集团持78.3%股份）、米斯尔船运公司（米斯尔银行集团持44.3%股份）^①以及米斯尔旅游公司（米斯尔银行集团持多数股份），双方合作在20世纪30年代末达到顶峰，其标志性事件是1938年北大染坊公司（布拉德染坊控制多数股权，持股20万埃镑；米斯尔银行集团拥有5万埃镑股份）和米斯尔精纺公司的成立。

由于埃及保护关税政策的实施及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竞争的加剧，1938年英国仅控制了埃及棉织品市场的27%，而轴心国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则控制了60.4%的市场份额。^②鉴此，一些曼彻斯特公司试图通过“跨越”关税壁垒，在埃及以注册组建英埃合资企业的方式超越竞争对手。当1934年英国棉布印刷协会与国家缫丝厂（埃及纺织工业公司）成功合作后，布拉德福德染坊协会寻求与米斯尔银行集团建立联系，经历多次洽谈，米斯尔银行集团最终同意双方合作。在布拉德福德染坊负责人建议下，1938年双方成立了两个新的股份公司，其注册资本均为25万埃镑。其中，由布拉德染坊控股运营的北大染坊公司，主要从事漂泊、印染等工作；由米斯尔银行主管运营的米斯尔精纺公司，专门从事精细纺纱生产。为促进两家公司在业务方面的协调，两家公司各提名两位成员担任对方公司的董事。这一合作遭到了部分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但是塔拉特·哈伯认为这未必是败举，因为合作不仅阻止了布拉德福德染坊在埃及独立建厂的可能，也为米斯尔银行集团的纺织业发展提供了机会。

诚然，布拉德福德染坊依靠精湛的纺织技术推动了米斯尔集团在纺织生产领域的扩张。这两家新公司生产的布料质量非常好，使埃及的纺织品产量大幅增加。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埃及棉花源自本国的供应量从

^① Eric Davis, op. cit., p. 145.

^② Ibid., p. 142.

占当地收成的1%增长到12%；在1931~1941年间，市场份额从12%增长到75%。^①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密斯尔银行集团与布拉德福德染坊的合作削弱了该集团最初秉承的民族主义纯粹性与排外原则，并逐渐走上与英国资本的合作之路。^②尽管如此，密斯尔银行集团仍然努力坚持建立纯粹性埃及化企业的初心，如1932年成立了密斯尔销售公司（主要销售密斯尔银行集团生产的商品，特别是纺织品），1938年成立了密斯尔矿业公司和密斯尔烟草公司等。但在这些新成立的公司中，只有密斯尔精纺公司和北大染坊公司盈利。

密斯尔银行的初衷就是利用银行资本创建新产业，实现埃及经济的独立发展，从而改变埃及的殖民地特征。但是，伴随着密斯尔银行集团在20世纪30年代业务的迅速扩张，其合作形式发生调整与变化，由原来的民族资本独资变成包括外资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

三 密斯尔银行的发展危机及其致因

密斯尔银行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发展与30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在国内外利益集团之间竞争加剧背景下，密斯尔银行集团几度陷入财政危机，最终在1939年的银行危机中达到了顶峰。^③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埃及地主阶级以及民众对埃及金融机构的信心丧失，许多银行出现集中挤兑现象，密斯尔银行也不例外。迫于政府的压力，塔拉特·哈伯被迫辞去董事，由亲英人士子哈菲兹·阿菲菲（Hafiz al - Afifi）接替。他认为密斯尔银行集团应该仅仅是一家信贷银行，应停止建立任何新企业。因此，新的领导层没有采取措施扩大密斯尔银行集团业务，而专注于从该集团及其现有公司获取利润。这与其创始人塔拉特·哈伯在1920年确立的目标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有学者所言，密斯尔银行集团危机的爆发在埃及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标志着埃及试图实现独立于外国资本发展的工业化与构建经济民族主义的努力暂时告一段落。

密斯尔银行集团在1920~1939年间践行埃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努力，从埃

① Roger Owen & Sevket Pamuk, *A History of Middle East Econom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 B. Tauris Publishers, 1998, p. 44.

② Robert L. Tignor, "Bank Misr and Foreign Capitalism", p. 178.

③ Marius Deeb, "Bank Mis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ocal Bourgeoisie in Egypt", p. 80.

及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米斯尔银行集团金融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银行存款流失，使得银行发展难以为继，但从集团自身的发展战略、埃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理想化等视角看，其危机的爆发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米斯尔银行实施“超政治性”策略的双重后果

米斯尔银行作为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鉴于国内政治利益集团复杂与多变的事实，该银行设想以“不偏不倚”的政治态度致力于埃及民族经济发展，尽量避免参与埃及党派政治，不直接依靠任何单一的政治组织，努力从不同政治力量获得影响力和支持力来推动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发展。这种试图塑造“超越政治之上”的形象却被米斯尔银行集团深度参与政治活动的现实所打破，尤其是在1923年埃及《宪法》颁布后，该集团在1923年和1926年分别成立的埃及经济委员会和高级合作委员会中获得代表权，以便就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①1924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压力集团，米斯尔银行集团副总经理以绝对优势当选为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塔拉特·哈伯当选为参议员兼金融、贸易、工业和海关委员会委员。^②米斯尔银行集团还努力在财政部、农业部和交通部获得影响力，因为上述部门控制着为某些类型的股份公司制定和发布法令的决定。为了换取这些部长在职期间的政治支持，米斯尔银行集团许诺为这些部长们在辞职或退休后保留董事职务。由于董事职位往往有利可图，这一策略在埃及政府的政治精英中非常受欢迎。

此外，米斯尔银行还通过省级分行和办事处公司雇用当地精英，获得了省级行政部门的有力支持。例如，1925年，省、城镇和乡村委员会将他们在埃及国民银行账户的1 106 851 埃镑转入米斯尔银行。^③米斯尔银行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采用的“超政治性”策略为其发展带来了切实利益。

随着20世纪30年代埃及政党数量的激增和内阁成员的频繁更迭，米斯尔银行集团在维系各政治派别力量平衡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1936年的《英埃条约》签订后，埃及政府国防开支增多，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困境。为了获得华夫脱党在内阁和议会的政治支持，米斯尔银行集团不得不在国家

^① Eric Davis, op. cit., p. 125.

^② Ibid., p. 126.

^③ Ibid.

财政困难时期拿出资金，为国防支出做贡献，但是对华夫脱党的支持又引发该党对立派的敌意，这就违背了该集团超越党派政治的传统姿态。更具戏剧性的是，1938 年的埃及选举直接将米斯尔银行集团卷入了国内政治漩涡。该集团因在选举中偏袒阿赫迈德·马希尔（Ahmad Mahir）而受到华夫脱党抨击，被质疑 1938 年关税法的签署完全是为了支持米斯尔纺织公司。华夫脱党的攻击恰好呼应了政治利益集团伊斯梅尔·西德基的反关税法运动。

鉴于伊斯梅尔·西德基、华夫脱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博弈，米斯尔银行集团除了通过向其选定的议员提供董事职位外，还向议会中难以偿还外债^①的土地所有者提供“贷款”，以便获得议员和政府要员的支持。这种政治回报的代价足以使米斯尔银行集团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1938 年米斯尔银行集团出现财政危机，塔拉特·哈伯不得不向埃及国民银行贷款，并施加政治压力。在财政部长阿赫迈德·马希尔的干预下，米斯尔银行集团与埃及国民银行达成一笔近 300 万英镑的贷款协议。这笔贷款暂时缓解了米斯尔银行集团的资金问题，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米斯尔银行集团出现挤兑，财政平衡再次告急。塔拉特·哈伯试图让新任财政部长侯赛因·西里（Husain Sirri）向埃及国民银行施压、批准资金请求，结果以哈伯辞职为代价获得了政府的财政支持。1941 年，埃及政府出资 200 万英镑，帮助米斯尔银行集团偿还债务，但需以集团未来获得的利润来偿还，并对米斯尔银行集团中经营不善的公司进行资产清算，不再组建新公司。事实上，挽救米斯尔银行集团免于被肢解的是重要原因是众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持有这些公司的大量股份。^②显然，米斯尔银行集团不参与政治，就难以大量获得体现为利益诉求的关税保护、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而上述政策恰恰是集团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这种理想化的“超政治”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埃及无法付诸实践，米斯尔公司则以牺牲财政资本为代价，维系集团发展所需的外部环境。米斯尔银行集团把自身发展更多地置于政治框架之下，从而获得了与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优势，由此该集团初期理想与现实发展形成悖论。

（二）埃及各阶层力量变化对米斯尔银行发展的影响

首先，埃及大地主阶级对米斯尔银行集团的支持是一把“双刃剑”。银行

① 这些外债来源于埃及信贷银行、埃及土地银行、埃及信贷抵押银行及埃及国家银行等商业银行。

② Eric Davis, op. cit., p. 167.

成立之初，大地主阶层为其提供了大部分资本，这些资本主要来源于农业部门中源自以棉花经济为主的资本积累。^①但是在1920~1939年间，埃及棉花经济增长中的许多固有矛盾不断显现出来：一是受世界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棉花价格下跌；二是人口快速增长与可耕地面积增幅有限形成矛盾，其表现是：1917~1937年间埃及人口增长了29.1%，^②而1915~1939年间可耕地面积仅增长0.5%，农作物种植面积仅增加7.4%；^③三是埃及土壤肥力下降，棉花失去高产优势。所有这些矛盾不仅导致米斯尔银行集团经济命脉棉花利润减少，也使埃及地主阶层的收入锐减及其对集团资本的支持萎缩。更严重的是，这些地主阶层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通过多重抵押贷款获得经济资源，并求助于米斯尔银行集团助其偿还债务，从而给集团增加了额外负担。当立法会议考虑建立农业和工业信贷银行之时，土地所有者却选择支持建立农业信贷银行。因此，米斯尔银行不得不为其附属公司提供所有长期信贷，这是造成集团1938年和1939年资金流动性危机的主要原因。^④

其次，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发展。1927年，埃及通过的公司企业法规定：埃及运营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2名埃及人，埃及本土员工占比为25%，公司25%的股份和债券需出售给埃及民众。^⑤因此，许多外国公司在埃及重新注册并重组，而那些有地位的埃及政客和企业家在新公司的组建中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政客精通政府事务，深谙如何通过讨价还价获取政府补贴。因此，随着这些外国企业的重组，以这些政企要员为代表的埃及工业资产阶级随之产生。但是他们依附于外国资本，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米斯尔银行集团倡导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关税壁垒政策。由此，这些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能扮演推进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反而加大了各利益集团的对立与竞争。显然，米斯尔银行集团在其金融崩溃之前承受着巨大

① Alan Richard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Rural Social Classes in Egypt, 1920-1939",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6, No. 2, 1980, p. 57.

② Eric Davis, op. cit., p. 111.

③ Samir Radwan, *Capital Formation in Egyptia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1882-1967*, London: Ithaca Press, 1974, p. 270.

④ Eric Davis, op. cit., p. 201.

⑤ Robert L. Tignor, "Nationalism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Interwar Egyp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0, No. 2, 1977, p. 188.

的压力。当然，这也是埃及民族工业与外国企业集团冲突的表现。

再次，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影响了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中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主要是大量受过教育的青年和工薪阶层人数的增加。他们常常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当地外国人主导的工商企业倾向于雇用他们自己社区的成员。埃及政府不得不向米斯尔银行集团求助，集团顺势以雇用大量埃及青年为条件换取政府的支持。其结果是，米斯尔集团雇用了大量高出实际岗位所需的白领工人，消耗了集团大量的财政资本。与此同时，米斯尔银行集团在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陷入某些岗位空缺的困境，因为很多生活在城市的埃及中产阶级对在农村地区就业持反感态度。为了说服那些白领职员到农村地区的轧棉厂、纺织公司或分支机构工作，米斯尔银行集团不得不向他们提供优厚的工资，这就进一步耗费了其财力。^① 同样，吸引年轻的经理和工程师到纺织厂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埃及没有大量可供米斯尔银行集团经营需要的专业管理技能人才，尤其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在埃及注册的合资企业的大量增加，人才供应变得更加有限。这也彰显了埃及在民族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最后，埃及社会的工人阶级也限制了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发展。一方面，米斯尔集团公司很难雇佣到熟练工人，尤其是纺织公司。例如，马哈拉库布拉（al - Mahalla al - Kubra）的纺织工人通常是农民，在工厂打工是他们维持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农民通常的做法是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会出来工作，但当他们收到薪水后，许多工人在接下来的一周大部分时间里都不会继续在工厂工作，导致劳动力市场不稳定。^② 另一方面，随着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发展，埃及工人阶级队伍也在壮大，其阶级意识日渐提高。他们经常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反抗，尤其在大型纺织厂，工人们经常对织布机进行暴力破坏，因为织布机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工人失业的增多。这种阶级意识与阶级利益的对立也不利于米斯尔集团的发展。

（三）欧洲资本的制约与塔拉特·哈伯经济民族主义的理想化

如前所述，米斯尔银行集团作为“民族银行”和实现埃及“经济独立”的目标是埃及民族主义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挑战的回应。但是，在19世纪末

^① Eric Davis, op. cit., p. 203.

^② Ibid., p. 202.

20世纪初，欧洲资本已经在埃及确立了主导地位，埃及经济发展的对外依附性日益加强。尤其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英国片面认为埃及缺乏燃料、技术和资金而不宜发展工业，要求埃及政府廉价出售纺纱机和织布机，关闭造纸厂，由此各种洋货充斥埃及市场，埃及民族工业惨遭摧残。^① 外国资本持特权涌入埃及，以各种手段阻碍埃及民族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英国一直试图阻碍埃及政府建立埃及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努力。

此外，在欧洲资本的不断渗透下，埃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缺乏明确合理的法律和商业程序的制度保障，^② 尤其是埃及社会双重的法律制度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埃及民族工业的开展，如混合法院对非埃及人有管辖权，而土著法院对埃及人有管辖权。适用于埃及本土的商业法规要比埃及的混合商业法规的限制性更强。更重要的是，外国人优待条例（Capitulations）的存在，使外国人在埃及不断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该条例是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开始给予欧洲列强的治外法权。虽然埃及从1930年起先后进行了关税改革，以期保护本国工业，但是这些外国人优待条例成为外国商人、企业不受埃及法律约束与免交税收的保护伞，这实际上在制度上保护了埃及民族工业与外国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状况。因此，在外国人优待条例在埃及被废除前，埃及民族工业的发展注定步履维艰。

然而，塔拉特·哈伯却低估了欧洲资本对埃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且表现出过于乐观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认为实现埃及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化相对容易。在塔拉特·哈伯看来，埃及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拥有大量闲置的资金。要挖掘这些巨大的财富，只需创建一个经济机构，如米斯尔银行即能解决，因为人们认为这个经济机构能真正代表埃及人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外国金融资本家。这种理想化的资本充盈与现实中其公司规模迅速扩大成正相关性，结果导致米斯尔集团结构薄弱、扩张过度，使得很多考虑不周的项目耗费了大量资金（仅1938年就建立了5家新企业），并加速了1939年集团金融危机的到来。米斯尔银行集团从一开始就缺少一个能够引领自身发展或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成熟缜密的规划，具有历史局限性。^③ 二是认为

① 杨灏城、许林根编著：《列国志·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4~95页。

② Barbara Kalkas, "Diverted Institution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Nineteenth - Century Egypt",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1, No. 1, 1979, p. 28.

③ Robert L. Tignor, "Bank Misr and Foreign Capitalism", p. 166.

在埃及运营的外国公司可以通过使之埃及化，从而转向服务于埃及国家利益。塔拉特·哈伯在年度报告中多次强调，只要外国社会群体能够“在平等和尊重埃及人的基础上工作，并且同意将埃及利益置于任何其他利益之上”，米斯尔银行集团会毫不犹豫地与这些外国公司合作。实际上，这些投资者对此未留协商余地，^①更不可能将埃及人或米斯尔银行集团的利益置于首位。例如，米斯尔航空公司成立后，埃及给予公司 30 年特权，其中要求英国对埃及人进行航空技术培训。实际上，该公司多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都是英国人，直到 1938 年在米斯尔航空飞行员中才有 1 名埃及人。塔拉特·哈伯对这些外国公司寄予厚望，而忽视了资本竞争的本性，所以他所预想的外国公司的本土化、埃及化现象鲜有发生。

总之，在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米斯尔银行“超政治性”发展战略，还是埃及经济社会阶层的自身变化以及塔拉特·哈伯本人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不成熟设想，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米斯尔银行最初的经济发展愿景的实现，并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

四 余论

米斯尔银行构建埃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努力在埃及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众所周知，自拿破仑军队入侵埃及后，埃及统治者采取不同形式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试图摆脱落后、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从穆罕默德·阿里的强制现代化到伊斯梅尔的模仿西方化、纳赛尔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萨达特的开放资本主义，埃及近现代史上的大多数现代化运动都是由国家主导的。^②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争取民族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一直是埃及有识之士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塔拉特·哈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浓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有识之士，他利用私人资本创建米斯尔银行，启动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现代化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一些成效，进而丰富了埃及现代化的发展内涵。

第一，培养了埃及人的经济独立意识。米斯尔银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实践

^① Robert Vitalis, *When Capitalists Collide: Business Conflict and the End of Empire in Egy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xvi.

^②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1952*, p. 3.

推动了埃及人经济主权思想的发展，其奉行的经济独立思想为埃及广大中小资产阶级所继承，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发起了反对本土外国资本的资产阶级运动，要求在商业交往中使用阿拉伯语。此外，1947年《股份公司法》得以通过，它规定股份公司51%的资本、40%的董事成员、75%的雇员和90%的工人应该是埃及人。^①对塔拉特·哈伯而言，他给埃及人留下的集体记忆是“埃及经济独立的推动者”，是“国家自我进步”的象征。

第二，强调了国家在埃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米斯尔银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实践为国家管理调控经济提供了早期实践，也为纳赛尔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一个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管理阶层，该阶层后来在战后埃及及公共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次世界之间埃及经济民族主义实践与后来的埃及化、国有化的“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

第三，推动了阿拉伯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米斯尔银行不仅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建立分行，还通过米斯尔航海公司与航空公司改善了埃及和希贾兹之间以及希贾兹内部朝圣者的旅行条件，从而加强了埃及和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

米斯尔银行集团兴衰起伏的历史，昭示了埃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实践并不能真正摆脱外部力量尤其是世界体系的影响，这是在世界体系已然形成的条件下对埃及作为体系外围国家的历史结构性的制约，但是外围国家可以通过创造自身的动力改变其在体系内的地位。因此，米斯尔银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挫折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源于国家主权的缺失、埃及经济发展的政治性、人力资源建设的薄弱、阶级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以及市场竞争意识不强等内在的因素。这些问题是现代埃及经济转型与国家构建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及症结所在（国家主权问题除外），也是目前中东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值得人们反思。当然，塔拉特·哈伯创建的米斯尔银行在埃及还处于半殖民地情况下构建经济民族主义的努力，一方面凸显了整顿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性，这是民族国家真正独立的基石；另一方面见证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埃及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持久动力，这种精神在当下国家发展中仍具有生命力。

（责任编辑：冯基华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Marius Deeb, "Bank Mis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ocal Bourgeoisie in Egypt", p. 83.

Arab states Exp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ingxia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rab World

She Gangzheng & Jing Jiayi

Abstract: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Arab world has witnessed two wav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in both cases social medi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related researches on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this article adopt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combines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rying to reveal the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over the last decade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ools – people – conten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 the context of upgrade from the PC Internet driven by “social network” to the Mobile Internet with “scene” as the core, the popularization of smart phones and videos in communication tools, the fact that women continue to speak out in the adversity of increasing gender gap, as well a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warfare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the “weaponization” of the platform have become prominent features of social media in current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rab world.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chnology monopoly and information flows manipulation by the West in gener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the Arabs need to tak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autious approach to media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find a way to secure their independence regarding public discourse. All these findings could help us better grasp the issues and dire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Arab countries.

Key words: Middle East upheaval; Arab countries;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edia environment

Bank Misr and the Building of Egyptian Economic Nationalism (1920—1939)

Li Fangzhou

Abstract: Bank Misr, an important economic institution in Egypt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20—1939), was established in 1920 by the famous Egyptian entrepreneur, Tal' at Harb, who aimed to utilize bank capital to create new industries and realize the independenc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economy. Bank Misr was buil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al' at Harb's nationalism came into being,

when Egypt entered the world market and when its economy stepped in a new era. The financial practice of the bank is a historical attempt to construct Egyptian economic nationalism. Bank Misr developed the history paradox of “super politics”, leading it to the developmental crisis. Though Bank Misr couldn’t realize Tal’ at Harb’s primary goals, its initiated practice of Egyptian economic nationalis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riving the independence of Egyptian economy and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of the countr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veloping economy in Arab countries.

Key words: economic nationalism; Egypt; Bank Misr; Tal’ at Harb

Turkey Sending Troops to Libya and Its Influen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aritime Policy

[*Qatar*] *Emad Y. Kaddorah*

Abstract: Once a maritime superpower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e Black Sea and the Red Sea, Turkey’s economic,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strength has grown rapidly since the 2010s, and with the discovery of massive amount of natural gas at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global and regional powers have become more intense. After more than a century of low – profil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inent, Turkey proposed the “Blue Homeland”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made a new maritime policy, tried to expand its maritime sphere of influence, and confronted global and regional powers to protect its own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interests. To beef up maritime presence, Turkey improved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signed maritime and military agreement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 of Libya and launched military intervention, so as to counter the international powers like the EU, Russia and Egyp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 landscape at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s likely to usher in long – term conflicts, and military tension or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based on new scenarios are also likely to take plac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Turkey; Eastern Mediterranean; “Blue Homeland”; Libya; military action

(责任编辑: 李文刚 责任校对: 樊小红)